

连日来,华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开启了一趟国内名校之旅,带队走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在外界看来,这无疑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华为希望加大与国内高校的合作。

一方面是全球竞争升级对人才需求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却是对国内高校学术浮躁之风、人才培养唯分数论的诸多诟病。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国内高校一直在朝着“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目标前进。而今,我们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多远?高校的理念和文化是否作出了相应的支撑?高校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服务社会等诸多使命怎样才能在既定的社会大环境下更好地完成?

近日,《中国科学报》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西民教授,他以办学实践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誓言在国内独树一帜。

“想要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高校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只有改变当下的资源配置体系,坚守教育本质的大学才能越来越多,并最终形成燎原之火。”席西民这样总结他的观点。

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不应该紧盯着那些指标行动,这些指标都是外在的,如果方向正确,随着大学的发展自然而然就会有的。在教育重塑的今天,他们最应该关心的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大学究竟应当怎样定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才能让这个学校顺应趋势、满足需求。这些做到了,学校一定会达到一流的水平。

真正的一流大学 从来没想着“我要排到一流去”

《中国科学报》: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努力的目标。请问,当您听到“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词汇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席西民:坦率地说,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又要搞一个新“工程”。

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围绕这一目标,我国相继推出了“985工程”“211工程”“2011计划”和“双一流”工程等。这些工程的推进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其结果是导致高校的领导和老师,特别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学者都围着这些指挥棒转。这些指挥棒,就像企业的KPI(关键业绩指标)一样。而大部分企业的KPI都会将其导向一个背离自己使命的方向。

2009年,我们将通过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建议,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格局和资源配置体制。但时至今日,工程导向性资源配置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围绕这些工程性评估指标的办学竞赛似乎愈演愈烈。大部分科教界精英,如校长、书记、教授们,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各项指标的争夺上,而没有将精力集中在涉及教育本质的事情上,并导致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形式多样的弄虚作假现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巨大机会损失和资源浪费。

在我看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变资源配置体系和机制,形成相对科学、透明、规范的分配规则,使得我们的书记、校长、教授们能静下心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建议是,将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大学等几类,各类大学都有自身明确的发展定位,然后由国家根据各大学的定位、规模、结构等,形成一个科学、规范的拨款方式,让各个高校不再用在争取资源上花过多时间。

《中国科学报》:在提到哈佛、牛津、剑桥等这些世界公认的名校的时候,大家也会说到它们教师的整体素质、科研成果、研究基金、毕业生成就等指标。在您看来,一流大学是否一定要拥有这些核心指标,这些指标的获得是否和这些大学内在的精神、文化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

席西民:不完全是。有这些指标的并不见得就是一所好大学。实际上,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关注的是教育的真谛和大学的使命,通过扎实的发展和长期的积累,就会展现出一流的本色,而不是想着“我要排到一流去”。“一流”是那些搞排名的人创造的。应该是先有大学的发展,然后才有所谓的一流排名。据我了解,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特别是顶级大学的校长,没有几个成天关注排名的。当然他们看到自己的学校被排到一流也会开心,但仅此而已。

以我有过比较接触过的牛津大学原校长、现任纽约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为例,他更关注的是“我应该做什么,这个世界的高等教育是不是应该重塑了”等问题。记得我们首次在牛津围绕这些话题深入交流后,他和我说:“席校长,你很幸运,你手里有一张白纸,在全球教育重塑的情况下,可以快速行动,塑造一个你想要的大学和教育,而我则是在夹缝中生存。”可见,相比于积淀深厚的老牌大学,像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西浦)这样的后来者是有机会的。

实际上,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不应该紧盯着那些指标行动,这些指标都是外在的,如果方向正确,随着大学的发展自然而然就会有的。在教育重塑的今天,他们最应该关心的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未来社会的

校长面对面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西民

逆俗生存很难 关键是拒绝「心理放弃」

本报记者 计红梅



席西民

“时至今日,工程导向性资源配置体系没有根本性改变,围绕这些工程性评估指标的办学竞赛似乎愈演愈烈。大部分科教界精英,如校长、书记、教授们,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各项指标的争夺上,而没有将精力集中在涉及教育本质的事情上,并导致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形式多样的弄虚作假现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巨大机会损失和资源浪费。”



西浦学生体验和学习虚拟现实技术。 西浦学生在实验室进行科研试验。

人才需求,大学究竟应当怎样定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才能让这个学校顺应趋势、满足需求。这些做到了,学校一定会达到一流的水平。称职的大学校长关心的是这些问题,凡是整天围绕指标转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校长。

究其实质,排名是给外行和外部人看的。因为大学是一个信息极其不对等的组织,外行和外部人很难了解其真相,于是排名可以给人一个参考;另外,没有哪个排名可以全面客观地反映一所大学。所以,我希望世界上大学排名越多越好,多到大家看过笑笑就忘了。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这个时候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指标都没有用,某些单项指标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一所学校的大局不是靠单项指标来体现的,它一定是一个整体、一个生态。

我们一直强调大学教育不只是学知识,知识现在哪儿都可以学,不来学校也可以学。学知识只是一个过程,目标是学生的健康成长,真正的大学教育是要让人全面发展。

素养教育会越来越重要

《中国科学报》:不久前,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300多所美国高校的招生主管联合发出声明,强调其在2021年的本科招生中不再倚重考查分数,而是看重申请人所应具备的品质,如自我关爱、学术表现、服务并能为他人做出贡献的能力等。这跟我们国内追求分数的选拔方式形成巨大反差。您认为,基于目前的现状,我国高校怎样才能培养出内心丰盛,具有独立、完整人格的人才,而不是制造出一堆只会考试的机器?

席西民: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难的问题。我想家长、教育家心里都很清楚,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都知道正确的路在那边,但事实上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为什么会走另外一条路?这是因为我们

的社会文化,包括我们的选人体系、游戏规则,把大家锁定在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上,努力地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这是最要害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高考制度可以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席西民:不要指望靠高考制度把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这是我最基本的观点。在我看来,高考制度是个分配制度。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区分出两类学生来,即大学的门槛而言,哪些人可以进去,哪些人不可以进去,但它并不能区分出这个人是否就是未来优秀的人才。

根据我们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我们发现目前考试成绩达到一本线左右的学生,甚至二本线的学生,都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关键是大学如何帮其成长和释放其潜能。我们西浦第一届的学生基本上是能进二本的好学校的学生,但这100多个学生毕业后,80%在全世界都是佼佼者。经过4年的教育,他们的潜能释放出来后,从一个世俗眼中“一般”的孩子蜕变成一个不一般的可以全球闯荡的世界公民。

此前,我在接受一个有关高考志愿填报的采访时,释放了一个信息,就是现在选专业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选大学。选大学也不要按标签去选,而是要看这个大学是不是真的关注人的成长,以学生为中心、用正确的教育理念帮助学生发展。

在中国,现在越优秀的学校越重视选学生,成天在那儿“抓”状元。但是,抓到后,对学生真正的关心、支持、帮助却并不那么足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大学教育不只是学知识,知识现在哪儿都可以学,不来学校也可以学。学知识只是一个过程,目标是学生的健康成长,真正的大学教育是要让人全面发展。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高校怎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席西民:就我们学校的经验来看,让人全面成长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点,让学生有成长的责任感。西浦的学生进校后,我们就会告诉他,你不是考试工具,你不是为高分学习,也不是为学历学习,而是为自己的

未来学习。你已经是一个年轻的成年人,所以一定要有责任心、独立精神。

第二点,一定要让学生找到自己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兴趣点去学,这时候学习才会有动力,他们才会努力。而现在经常是手段和目标颠倒了。

第三点,学会学习。这是指学生能够根据世界的趋势和需要,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做到极致,创造价值。

如果一个人拥有了这三种素质,既有责任感,又能担当,还有自身的兴趣点,并具备学习的能力,这个学生走向社会后就不会太差,所需要的只是运气、机遇了。如果能够拥有运气、机遇等外在机缘,这个人一定会变得很伟大。这就是我们的育人理念。我们培养的目标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公民。

《中国科学报》:在这一过程中,西浦是通过哪些途径来培养学生拥有这些能力的?

席西民:从入学到毕业走向社会,要想让学生成为一个可以进入复杂社会、能够在全球闯荡的人,其素养教育肯定越来越重要。我们学校逐步增加了几门课程,如个性与自我管理、全球数字公民行为、社会责任与慈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创业和企业家精神。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到未来社会的一系列挑战和需求,如全球互联共生、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的更加激化、气候变暖等可持续发展受阻、绿色环保问题日益严重等。

未来素养教育、基础教育之所以越来越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的一些基本技能后,人的造诣、修养、品德、创造性、智慧将变得日益重要,这些素养可以让人类藉由智能体帮着释放更大的潜能,并发挥更有价值的作用。如果这方面的修养不够,先进的机器不仅作用难以发挥,甚至还可能让人变得更坏。

时代给了个人一个赛跑的机会,也给了大学一个赛跑的机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群中总有一些逆俗的人,总有一些想拥有自己人生的人。他们不跟随大流走,通过大胆突破走出了一条让人羡慕的道路。

形成燎原之火需要体制机制改变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在整个教育大环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所高校有没有空间主动去调整自身教育的重心和手段,以培养出有责任感、担当意识,具备理性、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席西民:有空间。首先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偏差,还是跟我们的体制机制、社会认知有关系。大家要突破这样的文化、逆俗生存很难。

但是,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获得突破的。首先是这个社会给了我们突破的机会。我是77年上大学的,在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是一考定终身。相比之下,现在的社会提供了更多容错的机会,如果选错了可以调整,也有别的路可走,因为有纠错的机会。其次,教育资源也不完全都由国家配置,例如民办大学、中外合作大学等。对这些高校而言,真心品牌和教育创新的,他们的注意力一定会从那些显性指标转向教育的本质。最后,市场的选择很重要。在市场面前,能力的重要性会大于学位及学校的标签。

综上,时代给了个人一个赛跑的机会,也给了大学一个赛跑的机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群中总有一些逆俗的人,总有一些想拥有自己人生的人。他们不跟随大流走,通过大胆突破走出了一条让人羡慕的道路。

因此,就个体而言,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就高等教育总体而言,大面积的突破一定要等到体制机制改变、文化慢慢调整才可以。

这里又回到开始时我所说的话,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很重要,要让大学的书记、校长们能安静地坐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体制机制不改变,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行动,很难形成燎原之火。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在目前的环境下,高校领导们最需要坚持的原则是什么?怎样才能不突破自己内心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底线?

席西民:简单来说,就是不忘初心,做一个有责任的学者。无论何时,只要管理者愿意担当,就会有做事的空间。就像我最近一篇文章所探讨的那样,要创新和突破,需要寻求“最低合规性基础上的最大独特性”。实际上,不是社会没有空间给你,而是看你敢不敢坚持自己真诚、正直的判断。甚至你都不需要去挑战那些规则,因为那个规则本来就有余地。在我看来,现在高校面临的问题包括三个部分:体制性问题、管理问题和技术性问题。体制性问题需要慢慢调整,但是管理问题、技术性问题都可以先行解决。只要你有初心,只要你愿意做创新,敢于迈出那一步,就一定会看到现有的空间很大,可以迈大步,也可以迈小步。

最近几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参加“西浦全国教学创新大赛”的大学和老师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中国顶级大学和一些“双一流”大学的老师;有各类大学加盟我们创立的“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持续发展联盟”;也看到国内很多与我们合作的高校在教育上的变革成就。但是,由于一张无形的机制、习俗、文化和传统习惯的网似乎牢牢套住了绝大部分的人,现在愿意大胆突破的人还不够多。他们刚开始是抱怨,最后都懒得抱怨了,麻木了,变为“心理放弃”,内心再也不愿再思考了,被世俗裹挟着前行,甚至“追潮流”。

(下转第8版)

中国大学评论



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副教授

研究生教育经济学是座「富矿」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李克强总理、孙春兰副总理也在不同场合强调了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

作为教育系统金字塔的最高端,研究生教育直接影响国家战略,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但是,目前对于研究生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并不多,这和研究生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为什么需要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这是因为除了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外,研究生教育还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首先,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成本高,它的生均成本比本科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生均成本都要高。其次,研究生教育的学习成本是巨大的。很多学生毕业后不读硕士,尤其不读博士,而是选择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薪水是非常可观的。因此,读硕士或者读博士的机会成本要远远高于本科教育的机会成本,那么机会成本就会影响学生是不是要选择读硕士或者博士。

再次,影响研究生教育成才的因素特别多,比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影响因素都要多,影响机制也更加复杂。

最后,研究生教育系统本身也差异巨大。比如,硕士和博士的培养目标就有巨大的差别;再比如,一般而言教育收益会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到了博士阶段,相对于硕士的收益不升反降。可见,研究生教育有巨大的特殊性、复杂性。正因为它的重要性、复杂性,非常有必要对研究生教育中的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而研究生教育的经济学研究也一定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研究生教育的经济学,目前可以集中从如下领域进行研究。

首先,研究生教育的成本与收益研究。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它的直接培养成本该如何核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老师的工资是否需要计算到成本里面?老师的科研经费是否应该计算到成本里面?如果应该计算到成本里面,那么如何计算分摊的比例?这些都是很复杂的研究议题。

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培养成本很难计算,这导致它的收益率也同样很难计算。在教育经济学领域,明瑟收入方程是计算教育收益率最普遍的一个工具。但是明瑟收入方程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就是接受教育只有机会成本。但是,一方面,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培养成本很高,使得明瑟收入方程的基本假定不再适用;另一方面,研究生在读期间有一些补助与资助,或者很多研究生已经有了实习、兼职收入,这些都使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计算起来非常复杂。尽管现在在研究直接采用了明瑟收入方程来计算研究生教育的收益率,但却并没有对直接培养成本不能忽略为零和机会成本的准确计算进行专门讨论。

其次,研究生教育的生产函数。教育生产函数是指分析影响学生成绩或者效果的一整套分析框架。国际上关于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经久不衰,但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关于教育生产函数的汗牛充栋的研究中,很难找到影响学生成绩或者效果的规律。对于研究生而言,学习与研究更加个性化,学习与研究的衡量指标难以统一,影响研究生的学习效果与研究产出的因素更加繁杂,研究生的成才规律更加错综复杂。这些一方面说明了研究生教育的生产函数很难研究,另一方面也说明研究生教育的生产函数急需研究,而且需要数量多、范围广的持续深入研究。

再次,研究生教育的效率。前期,笔者已做过关于研究生教育效率的一系列研究,是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效率的测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研究生教育对大学其他产出,包括本科教育、国际教育、远程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等都能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能够减少其他产出的成本、提高其他产出的效率,而这种现象在其他产出中是没有的。这说明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提高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但是目前相关人员对此的关注却并不多。

最后,研究生教育的资助。随着研究生开始收费,对研究生的资助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资助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现在劳动力市场上高端工作岗位的工资普遍增长,大都市的生活水平也不断上升,那么对研究生教育的资助水平多少合适?另外,到底是要多设奖学金还是助学金?到底是资助研究生的生活还是学习或者研究?对研究生研究的资助到底是资助参加学术会议,还是对其海外游学进行资助,抑或是给予研究生本人更多的研究经费?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微乎其微。然而,要想提高研究生的资助效率与培养效率,针对研究生资助的实证分析要大大加强。

在未来若干年内,围绕研究生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为此,笔者向广大关心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学者发出邀请,一起朝这个富矿挖掘,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才智与力量。